

亡命海外
的廣東企業家

首次登上南極

步蠡生沉浮記

洋廠長格裏希在中國

中國大菜籃子

「寡婦村」的笑聲

圓了九十九年的夢

今日「武狀員」

安得廣廈千萬間——中國房改紀實

新一代「食利人」——證券市場初探

私營經濟這條躍動的「龍」

比深圳還「特」的地方

十年磨一劍——中國特區透視

工業打破「大鍋飯」

《企業破產法》破產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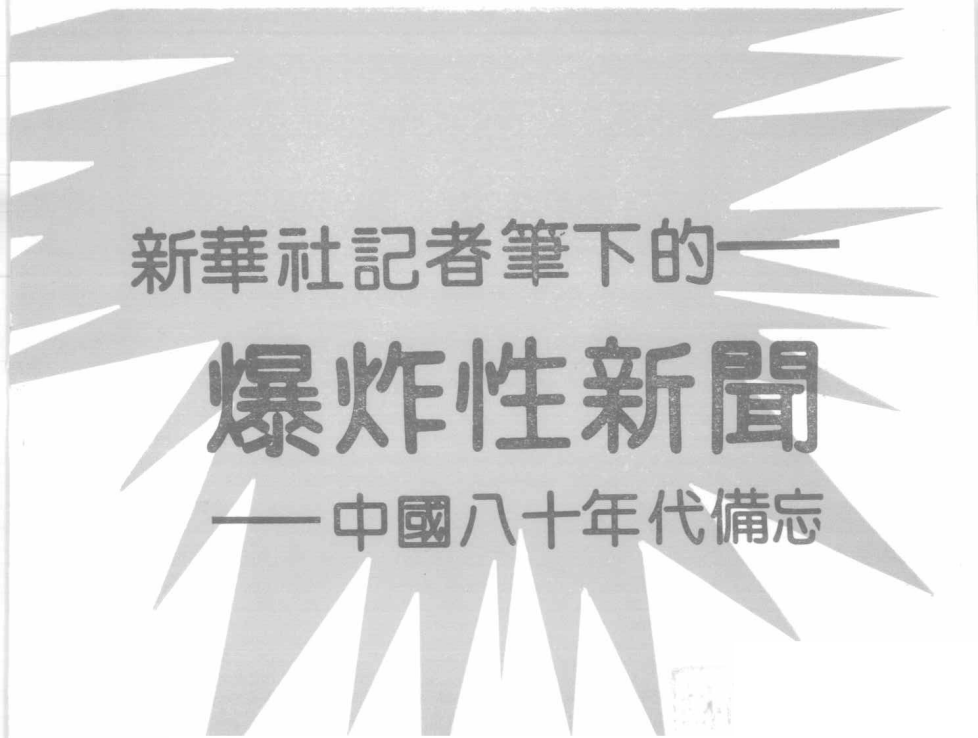
「農村包圍城市」第一槍

●主編 張持堅 謝金虎 蔣耀波

爆炸性 新聞

——中國八十年代備忘

●改革出版社



新華社記者筆下的——

爆炸性新聞

——中國八十年代備忘

主編 張持堅 謝金虎 蔣耀波

改革出版社

爆炸性新闻

张持坚 谢金虎 蒋耀波 主编

*

改革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德里北街23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15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 000

ISBN 7-80072-059-4/F·039

定价：6.80元

目 录

留下八十年代	(3)
“农村包围城市”第一枪	沈祖润(5)
《企业破产法》破产了吗?	周保华(17)
工业打破“大锅饭”	高 欣(29)
十年磨一剑	顾万明(39)
艾滋病叩开国门	朱 丽 于长洪(46)
缉毒队在行动	罗 萍 金小明 张殿光(56)
东南走私扫描	魏运亨(64)
沸沸扬扬话洋货	王 旭(74)
“全民经商”热浪	陈 芸(86)
喜忧掺半的民工潮	葛象贤 屈维英(95)
广告现象透视	王志纲(105)
文艺界“走穴”面面观	张宝瑞(119)
通货膨胀在中国	陈 芸(126)
三角债——中国经济的“雷区”	谢金虎(136)
黑色咏叹调	崔济哲(146)
甲肝席卷大上海	叶世涛 马雪松(160)
大兴安岭火灾亲历记	张持坚(171)
“飞虎队”覆灭记	令完成 许克敖(181)
新“衙内”的末日	陈毛弟(195)

“渤海二号”祭	杨继绳(205)
泛着血色的漩流	陈坚发(219)
谋财害命假郎中	林群英(231)
震惊中外的重大列车事故	陈雅妮(241)
厦门劫机事件始末	王伟中(250)
黄岛油库大爆炸	刘海民(259)
“吃喝专员”曝光记	万武义(270)
惨祸,发生在最平稳的江面	费 强(281)
“超生游击队”觅踪	杜 新(291)
谁是凶手?	孙宁海(298)
私营经济这条跃动的“龙”	吴锦才(311)
新一代“食利人”	白国良(321)
安得广厦千万间	林 晨 张超文(329)
今日“武状元”	徐京跃(344)
圆了九十九年的梦	范丽青(353)
“寡妇村”的笑声	詹 湘(365)
中国大菜篮子	张 蕾 王 满(377)
洋厂长格里希在中国	孙玉昌(387)
步鑫生沉浮记	童宝根(397)
亡命海外的广东企业家	顾万明(410)
首次登上南极	朱幼棣(417)
千年奇珍出土记	王兆麟(425)

留下八十年代

——卷首语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哪个年代可以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媲美？

刚刚过去的这个年代，是一个崭新的年代，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个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代！

这个划时代的年代是由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序幕的。从此以后，古老的中国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起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工商企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区的崛起，门户的开放，竞争的引入，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起步……短短 10 年，中国以其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一切在摸索之中。这就难免失误，难免出现问题。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失误和问题，才使得八十年代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波澜壮阔，更加具有历史的魅力和价值。

出于对这一年代的偏爱，我们请了四十几位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新华社记者，写下了这本《爆炸性新闻——中国八十年代备忘》，留下八十年代。

自然，小小一本书，三十来万言，是描绘不尽恢宏的八十年代的。这本书记录的仅仅是她的局部——一些能够领略她丰采的局部。

书中对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述，也难免有不当之处。但这不要紧。离八十年代太近的我们每个人，去评

述八十年代都会有偏颇。要紧的是，四十几名采访过这些事件的新华社记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画卷和资料，待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离八十年代远些、再远些时，翻翻这本书，一定会越来越清晰地看清这个年代的壮丽面目，越来越清醒地认识这个年代的伟大意义。

愿八十年代的历史继续延续、光大，永不中断！

· 编者 ·

新华社合肥 1980 年 6 月 29 日电
(记者沈祖润、王礼赋)实行“大包干”生
产责任制的安徽省凤阳县,今年夏粮获
得丰收……

“农村包围城市”第一枪

○沈祖润

这是奏响当代中国改革史的壮丽一页,是展现八十年代风云无法省略的一个镜头:

1978 年 12 月的一天,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队一间破草屋里,一群穿着破衣烂衫、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郑重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

是否言重了?须知,时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左”的桎梏没有被打碎,这样做意味着“反革命”、“搞复辟”、“想变天”。

然而,后来的改革进程证实,这些纯朴的庄稼汉,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点火人。

这份大包干契约,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事隔多年之后,许多人仍对这迸发农村改革火花的壮丽瞬间感到神秘,很想了解,为什么农业大包干偏偏诞生在凤阳

县小岗？这一火种是怎样燃起的？为什么它能成为扑不灭的火焰迅速燃遍全国？

作为跟踪这一历史进程的一名记者，在这里愿向读者翻开那一页页的采访记录。

地 热

1977年，对安徽人民来说，是个吉庆的年份。6月间，党中央派来万里同志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一上任，就果断地掀掉了被“四人帮”的代理人紧紧捂住的“揭批查”盖子，一举打开了封冻人心的极左坚冰。

多少年了，在坚冰重压下，安徽的黄土地见不到党的政策阳光。1977年秋，滁县地委呈给省委的一份调查报告，历数极左政策对农村的极大危害，说：在农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被污蔑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污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多种经营被污蔑为“金钱挂帅”……农民的手脚被紧紧捆死，良田荒废，百业凋敝。

让我们从一个生产队看看“左”毒危害之烈吧。下面几段是当年小岗队副队长严宏昌与记者的谈话：

“1974年，18户人家的小岗，竟派来18个抓阶级斗争的工作队员。俺当时寻思，小岗没有地、富，除1户下中农，全是贫、雇农，哪来那么多阶级斗争？”

“谁知，工作队负责人见面就训话：‘今天我们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子、鞭子，非把你们从资本主义路上赶到社会主义路上来！’他们批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养鸡鸭、种蔬菜就是资本主义。农民严全昌就是种了一点葱、姜、辣椒，被打成‘暴发户’，批斗好几场。反正，大批判的铁扫帚下无好人，全队17个男劳力，15人当过队长、副队长，最

后无人再可以‘上马’。

“说当队长，也是个摆设。那年头，叫你干什么活，干多长时间，在哪里干，都得‘绝对服从’；种什么庄稼，种多大面积，种在哪里，也得请示后照办，把俺管得象犯人。

“年年抓‘纲’抓‘线’，‘运动’得粮食总产从1955年的16万多斤掉到70年代的三、四万斤，人均口粮只有100多斤，虽然政府发救济，但还是年年缺几个月的粮，只好讨饭度春荒。”

象小岗这样的讨饭队，在滁县地区的定（远）、凤（阳）、嘉（山）一带，有一大批，年年形成一支三、五万人的讨饭人流，涌向各地。

1978年8、9月间，记者走访了定、凤、嘉一些讨饭队，其赤贫状况令人瞠目。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门，3户没有桌，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衣裤。当过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记者又到雁塘头、小岗等生产队，穷得更可怕。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唱道：“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国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万里同志看了滁县地委象控诉书一样的调查报告，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深入调查，摸清全省情况。他自己也跑到农村去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深感，“左”的危害在农村太大了，太深了，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明确提出：“拨乱反正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手。”

根据这一决定，省委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几下几上地征求意见，制定了一份《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1977

年11月15日下达全省，被简称为省委《六条》。

滁县地委的报告和省委《六条》，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的时候，最后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刚刚开过，会议要求“向大队核算过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击破坚冰的无畏勇气是不可能提出的。

坚冰一破，地热就升腾了！

省委《六条》一到农村，引起了想象不到的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沸腾，象当年迎解放、庆翻身一样欢欣不已。

一些地、县委以落实省委《六条》为契机，狠抓了年终分配兑现。许多生产队第一次召开分配兑现现场会，让得款农民当场领取现金“红纸包”。尝到政策兑现甜头的农民，产生了改革“大概工”、“人头分”的强烈要求。一时间，全椒县出现了“定额记工”、云安县产生了“小段包工”，凤阳县建立了“一组四定”责任制（分组劳动，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各种改变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做法，被农民创造出来。

聚 焦

1978年初春，从省会合肥又吹出一股和风，给解冻的大地送去阵阵暖意。

万里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作总结时，以坚定的语气喊出了一句顺人心、合民意的话：“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彻底破除‘政治可以冲击生产’的谬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促进生产的好办法。”

这个讲话的传达一杆子插到基层，使这股暖风一直吹进农民的心头。人们的思想也从“两个凡是”的氛围里突破了一步。

以计时间、计数量为主要内容的计酬办法，在安徽流行了一段，很快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这些计酬办法的核心是质量验收，而多数农活的质量要最终通过农作物的产量才能体现。这样使各个管理环节上的农活质量的验收，或流于形式，或走过场，最后还是变相的“人头分”，没能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到夏季分配时，农民一看，甩袖大干的与藏奸躲滑的还是“排排坐，吃果果”，人均一份，普遍对不联产计酬的办法强烈不满，产生了新的变革要求。

农民出身的凤阳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1978年3月在前倪生产队蹲点，向农民宣讲了万里讲话的精神，一下壮了大家的胆，有人将憋在心里多年的话吐了出来：“一个队绑在一起大呼隆受穷，不如分开干！”詹绍周帮助大家建立了一套“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超奖减赔，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不料，走漏了风声，全公社多数生产队也悄悄学着干。

几乎与此同时，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天长县新街公社也实行了“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和“责任到人、联产计酬”（棉花）的责任制。

1978年，安徽省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减了产。但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在大旱之下也获得了大丰收。

可是，这种责任制一是不符合“全国学大寨会议”不准联产计酬的规定，二是将“三级所有”变成了“四级”，这在当时简直“大逆不道”。果然，凤阳县就有人提出“这是方向性错误”，并在广播会批评。由于县委书记陈庭元和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查组的保护，才免被扼杀。

1978年9月，滁县地区召开“四千会”，马湖、烟陈，新街

等几个地方的“增产秘密”亮了底，连同反对意见一齐被端了出来。已进行了几个月的“真理标准”的讨论，鼓足了与会者的勇气。会场象开了锅，沸腾化的议论，使气氛空前热烈：

——过去二十年，花样翻遍了，办法掏尽了，为什么搞不上去？要是个公社上不去，可以说这个公社书记是笨蛋。可是全区 240 多个公社都上不去，全省、全国多数公社都上不去，难道那么多人都是笨蛋？

——中国这么大，天上的，地下的，自然的，社会的情况千差万别，为什么要一刀切，非要用一个模式来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吗？

——“三级”是社会主义，“四级”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哪家的道理？

声声热气扑面，句句落地有声，使地委领导受到极大震动。区、乡干部纷纷要求上面松绑，让下面放开手脚干。

会后，地委书记王郁昭到省里向万里作汇报。他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滁县地区的情况，并表示了自己支持变革。万里听完，点了点头，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他们去实践。如群众有要求，可以搞些试点。”

万里同志毫不犹豫地明确支持改革分配制度，因为他 7 月份亲自到凤阳作了调查，心里早有了底。他还要求地委领导多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新问题。

那一年，老天好象有意与改革者作对为难。安徽省已经 9 个月没下过透雨了，冬缺雪，春少雨，梅季干，伏里火，秋似伏，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使淮河露了底，塘库多干涸，灾情最重的滁县地区，土地龟裂，庄稼枯萎，田野一片焦黄。许多地方人畜无饮水，根本谈不上抗旱下种了。

9 月 11 日，万里同志在王郁昭陪同下，再次来到凤阳调

查，并召集定、凤、嘉三县县委书记开会，一是安排抗灾和生产自救，二是了解生产责任制的进展情况。

在这之前，万里同志请来了北京打井队，打井提水，请来了部队运输团，给灾民送水送粮。“保人、保畜”的目标达到了，但秋种很困难。

万里同志强调：不要让今年的灾情影响明年的生活，势必千方百计种好小麦。最后，万里一字一句地宣布了一项震动全省的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谁种谁收，国家免除征购；从集体耕地中借给每个社员一分地种菜，每头母猪一分地种饲料，以度过灾年。”

省委的“借地”决定，使许多干裂的耕地田分到了农户。这些本来锄挖不动，牛犁不开的“石板地”，经过老少用锹挖，用锤打，手提肩挑端水浇，全部种上了小麦，而且长势明显比没有分到户的大田里的好。

“借地”打开了人们包产到户的新思路。从秋种开始，凤阳、来安、肥西等县都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而且大有“包产到组”迅速滑向“包产到户”的趋势。尽管不少县委、公社的领导大声呼吁：“稳定到组”。但农民笑答：“不到户，稳不住。”

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就在同样大旱的情况下，1978年种的小麦，第二年夏收，来安、肥西都出现了包产到户比包产到组的增产多，而还是“大呼隆”的，全部减产。什么原因？因为“包产到组”还是“小呼隆”，平均主义分配的矛盾没有解决。

如果说，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照耀改革的阳光，那么手持改革分配制度的聚光镜的安徽农民，在1978年，一直在劳动组织的大小，联系什么计酬这两点上，选择最能促进当地生产力发展的焦距。初步的结论有了：“联产比不联产好，到户比到组强。”

燃 烧

当改革分配制度的聚焦集中到联产和到户这两点上时，能够将这两点合二为一的包产到户，一时成为农民重点选择的责任制。但是包产到户有很多繁琐的程序：一要为各个田块的各种农作物定产，二要为多种作物的斤两定工分，三要为交产农户以产记分，四要在一年两季按分为各户分粮分款。眼花缭乱的数据，进进出出的账目，使识字不多的农民心烦意乱。特别是粮食交到队里再称回来，更被农民说成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基层干部也为此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往往吃力不讨好，平添了许多苦恼。大家都想寻找一种既联产到户又简便易行的新办法。

这种办法是小岗人首先找到的。

20 户人家的小岗队，先分成四个作业组，干崩了；又分成八个，还是合不拢。怎么办？刚担任副队长的年青人严宏昌，是个初中毕业生，去请教刮“五风”时幸存下来的队里三位老汉之一的关庭珠。他说：“61 年的‘救命日’很中用，一干就增产。”严宏昌眼睛一亮：“对，那叫责任田，同包产到户差不多，干脆一杆子包到户。”关老汉巴嗒着嘴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他告诫说：“那些年批‘责任田’，全省 10 万干部被斗被关，多少人家破人亡！”血气方刚的严宏昌说：“年代不同了，现在讲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只要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就能干。人家马湖公社的人，偷偷走了第一步，现在不是大家都走了，俺们为啥不能偷偷走第二步？”这句话激励了耿直的队长严俊昌：“只要社员一致同意，出了事，咱几个顶。”

在社员会上，严俊昌说：“咱们干脆承包到户，交够‘皇粮’，缴清提留，剩下全是自己的，也不要记分算账了。”会场一

片“行!”“干!”

严宏昌站起来说：“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干！但这是偷着干，瞒上不瞒下，要保密。不过丑话说在头里，不能‘肉吃千口，罪落一人’，口说无凭，得立个字据。”他话音一落，大家齐说“同意”。于是，严宏昌立即取纸拿笔，当众写下：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到会21位农民，3人盖了私章，18人按下血红的指印。

过了几年以后，我们才懂得，这张契约，是一支引导农村改革深化的火炬，它既标志着农村分配制度改革最佳方案的产生，又预示着一场全国性的伟大变革的开始。

小岗火种一触即燃，是因为它凝聚了安徽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地热，又经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阳光聚焦。

小岗人对自己的承包办法，起初并没有取名大包干。说起大包干的来历，还有一段过程。

1979年2月，在凤阳县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四干会上，代表们对全县已有60%的生产队实行的马湖公社创造的“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办法评头品足，大家一摆，定工要搞几十项，分配要算许多弯弯帐，不仅干部管不好，社员也弄糊涂了，都认为要改进这种繁琐的办法。有些代表说，政府不就是想多要一点粮食吗，干脆来个大包干，保证交齐国家征购，扣下集体提留，剩下的由作业组内部分配。大家都说这样大包干好。就在四干会期间，陈庭元请王郁昭请求万里，万里当即表态：“大包干可以搞。”于是，县委在四干会上制

订了大包干的章程。以后不到半年，全县 80% 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这是包干到组。后来小岗的办法传开以后，也被称作大包干，那是包干到户。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梨园公社干部知道了小岗包干到了户，想采用不给他们稻种的办法，压他们拢起来。拿过锄头，甩过牛鞭，和农民在一起滚了几十年的陈庭元听说后，就对公社书记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多收点粮食，就 让这个队试试吧。”小岗的大包干幸存下来了。

燎 原

小岗大包干快一年，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1979 年，小岗粮食总产 13 万 2 千多斤，相当于 1966 至 1970 年 5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收油料 3.5 万多斤，是过去 20 年的总和；交售粮食是“任务”的 10 倍，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22 元上升到 400 元，一跃成为全县的“冒尖队”。

小岗一年巨变的消息，震动了凤阳，震动了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王郁昭挨个看农户，看到家家囤满仓流。社员们对他说：“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哦！”这位注重调查研究的地委书记似有所悟。第二天，他干脆将地委委员都请到小岗，又是挨家挨户地看一遍。临走王郁昭说：“同意你们先干三年。”

1980 年 1 月，万里闻讯也到小岗来了。他走进一家，乡亲们就硬往他手里、袋里塞花生。万里一户不漏地走遍全队，和老少爷们拉家常，在庄里庄外转了 4 个多小时，看到家家粮满囤，草成垛，又听顺口溜：“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干三五年，就能吃陈粮，烧陈草”。他呵呵一笑，当即说：